

# 善用議員多元視野 編制五年規劃



日前，立法會主席李慧琼率領發展事務委員會及多名議員赴北都會區考察，深入了解最新建設進展。李慧琼表示，議員將結合考察所得第一手資訊，就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向特區政府積極建言。這不僅是議員履職盡責的生動體現，也標誌着在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格局下，立法會更加積極主動為香港的治理出謀劃策，更好協助特區政府編制五年規劃。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不能只靠特區政府一己之力，更需要立法機關在政策形成的「前端階段」積極參與。長期以來，立法會在政策周期的角色，主要集中於法案提交後的審議與監察，但首份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則要求議員在更早的階段發揮作用。

與持份者溝通 令規劃接地氣

事實上，新興產業的落地，涉及國際標準的採納、技術瓶頸的突破，以及法規缺位的填補。議員可在香港五年規劃編制期間，就新興產業的技術標準、監管框架，乃至產業配套等核心議題，主動與特區政府及各持份者展開深入溝通，一開始便具備前瞻視野，盡量避免事後補救。凝聚共識，本是立法機關連結社會各界的天然優勢，在香港五年規劃的前期善加發揮，正是立法會議員對香港長遠發展應有的實質貢獻。

北都建設承載着宏觀的產業政策，也關乎未來數以百萬計居民的切身生活。今次考察中，議員視察了規劃為大學城的用地，了解首批土地今年完成平整的進度，並就產

學研合作如何帶動區域發展提出即場提問，這種考察、調研的工作方式，正是確保政策具備「地氣」的關鍵所在。香港五年規劃亦要充分體現以民為本的政策理念，讓北都建設得到廣泛支持，避免潛在的摩擦與爭拗，消耗香港來之不易的發展動能。

訂立可量化階段性指標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加快北都建設，這為香港五年規劃賦予了國家戰略層面的定位，也意味着北都的發展不再是孤立的本地事務，而是大灣區整體布局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互聯互通是北都發展的核心命題：不僅是基礎設施的硬聯通，更需要規則、標準與要素流動的軟聯通。在此背景下，香港五年規劃也應就數據、資金、人才等要素的跨境流通作出更清晰的規劃，實現兩地優勢互補、資源最優配置，真正體現協同的實質內涵。例如，北都智慧城市建設及產業園智能化運作，都高度依賴數據跨境有序流動，立法會可在前期就跨境數據流通的安全和便利

事宜，與特區政府及業界進行更加全面、細緻的探討，為北都重要產業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就探討香港五年規劃時，立法會可以審視長遠目標與五年部署之間的路徑是否清晰，明確特區政府為可持續發展建設預留足夠的制度與空間餘量，訂立可量化的階段性指標，並建立定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的問責機制，確保藍圖不流於空談，例如在北都區內「打造零碳交通體系」，長遠打造成為「國家級綠色低碳示範區」，朝「2050年碳中和目標」穩步邁進。然而，要實現這一長遠規劃，早期需要確保充電設施全面鋪設、電力系統完備，接入可再生能源等。今天早一分部署，日後便少一分缺陷，也能讓香港五年規劃具備更強的政策連續性和可行性。

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是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驗，也是檢驗在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格局下，立法機關能否與時俱進、展現承擔。只要行政立法同心同向，各界協力並進，就能凝聚發展共識，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能，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 一年一檢最低工資 紓緩貧窮激活社會動能

吳秋北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就《2026年最低工資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進行察悉動議，有關修訂內容自2026年5月1日起生效，將法定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由42.1元調高至43.1元，加幅為2.38%。法定最低工資由以往的「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體現科學、公平、可預期的優勢。最低工資制度從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社會文明的底線保障。新機制以科學公式取代政治博弈，以系統配套化解單一風險，是香港勞工權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須持續檢視和優化機制，讓最低工資可以追上物價增幅，讓基層勞工共享發展成果。

「一年一檢」新機制的優點，具體來說包括：

一、動態調整，精準回應經濟變化。新機制採用「消費物價指數+GDP增速」雙軌模型，並引入「十年GDP趨勢增長率」作為平衡參數，確保工資增長與通脹及經濟實質增長掛鉤。過去「兩年一檢」的滯後性常導致工資追不上物價，而「一年一檢」將有效填補調整空白，保障基層勞工購買力。

二、公式透明，減少人為干預。通過方程式計算調整幅度，杜絕了主觀博弈與政治化拉扯。每年2月公布建議報告，5月實施，讓勞資雙方均能清晰預見成本與收入變化，為規劃提供確定性。

三、底線保障，兼顧發展公平。新機制設置「零下限」與「1%上限」，既防止經濟衰退期工資負增長，又避免過度調升衝擊企業。此設計平衡了勞工權益與企業承受能力，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調升工資對僱主影響甚微

雖然新機制作出了制度上的改善，但也要看到其不足：

第一是受益人群太少：根據最新數據，2026年5月最低工資調升至43.1元後，預計僅有18,800至39,400名僱員受惠，僅佔全港僱員總數的0.7%至1.4%。這意味着絕大多數基層僱員並未從政策調整中獲益，尤其是那些工資略高於最低標準但實際生活仍困難的群體。

第二是生活成本壓力未解：即使現時最低工資為時薪42.1元，看似不低，但香港作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該收入仍難覆蓋基本生活開支。以一對夫婦為例，按此標準計

算，月收入僅約17,389元，與四人家家庭貧窮線20,800元仍有差距，難以負擔高昂的住房、教育等剛性支出。

接下來也要駁斥有人渲染所謂「最低工資上調將引發工資上漲漣漪效應，從而增加僱主負擔，引發物價飆升、就業萎縮」的謬誤，這些謬誤事實上忽視了香港的現實情況，具體錯處在於：

一、誇大成本傳導。最低工資僅佔企業總成本的極小部分。數據顯示，最低工資調整後，額外薪開支只佔企業總薪開支的0.01%至0.03%（含工資級別連鎖效應）；香港餐飲、零售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資成本佔比不足10%，且多數企業利潤遠超工資增幅。實證表明，過去最低工資經過多次調升後，企業多通過優化管理、提升效率消化成本，而非直接由企業承受或轉嫁消費者。

二、忽視就業市場實況。香港最低工資實施18年來，基層勞工失業率不升反降。統計處數據顯示，相關行業就業人數持續增長，工資提升更有效抑制了「在職貧窮」。反觀低薪陷阱，才真正導致勞動力流失的惡性循環。

三、忽略結構性支持。特區政府已配套推出「中小企業持續基金」、「僱員再培訓補貼」等措施，通過財政資源對沖最低工資調整的影響，助力企業轉型升級。政策組合拳下，「漣漪效應」無從談起。

打破低薪困局 增加內需動力

事實上，最低工資新機制可打破低薪困局，激活社會動能，更是社會價值的一次糾偏。

第一，尊嚴工資讓基層勞工告別「在職貧窮」，實現體面生活。

第二，激勵投資於人，提升生產力。合理薪酬倒逼企業告別低效競爭，轉向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投入。

第三，帶動消費，有助經濟良性循環。最低工資增長可直接轉化為內需動力，刺激本地經濟。有數據顯示，最低工資每增加10%，可帶動GDP增長0.2%至0.3%。

我們應以科學取代臆測，以行動破除迷思。最低工資制度從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社會文明的底線保障。新機制以科學公式取代政治博弈，以系統配套化解單一風險，是香港勞工權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須持續檢視和優化機制，讓最低工資可以追上物價增幅，讓基層勞工共享發展成果。

# 港金融中心排名高 展現強大競爭力

莊紫祥 全國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



英國智库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最新發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39)報告，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奮的成績：香港穩居全球第三、亞太區首位，綜合評分升至765分，與紐約、倫敦僅相差2分和1分，多項核心金融細項登頂全球。香港在全球金融格局激烈競爭中實力持續攀升，是香港優勢的有力彰顯，更是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斷鞏固的最好證明。

此次GFCI排名，頂級金融中心競爭白熱化，第一梯隊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排名與上期持平，評分全數上漲1分，彼此差距僅1分，呈現齊頭並進之勢。香港能在這場頂級較量中穩守陣地，更實現細項評分全面突破：銀行業、融資躍居全球第一，金融科技、保險業蟬聯榜首，投資管理攀升至全球第二，營商環境、基礎設施等五大核心維度穩居全球三甲。

回望2020年至2023年，香港曾受外部環境變動、疫情等因素影響，GFCI排名一度滑落至第六，細分領域優勢也有所減弱。但自2024年以來，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獨特制度優勢、國家堅定支撐與成熟市場基礎，實現強勢反彈，不僅重返全球第三、亞太第一，更實現評分連續攀升，逐步縮小與紐約、倫敦的差距，走出了一條堅韌的復甦上升曲線。

香港金融實力的持續提升，根源在於其不可替代的核心優勢。作為全球唯一兼具普通法體系、低稅營商環

境、高效監管體系，且深度連接內地龐大市場的國際金融樞紐，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獨一無二。滬深港通、債券通等互聯互通機制持續深化，讓香港牢牢佔據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地位；同時，香港在數字金融、綠色金融、家族財富管理等新興賽道加速布局，匯聚全球頂尖金融機構與專業人才，構建起完備且多元的金融生態。即便面臨新加坡的緊迫、地緣政治波動等挑戰，香港依然憑藉超強市場韌性，穩固核心競爭力，成為全球資本青睞的資金「安全港」，本屆「裕澤香江」高峰論壇的熱烈反響，便是國際資本認可香港的直接體現。

當前正值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全球政經格局加速演變，香港金融發展迎來全新機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出的「金融+」發展策略，為香港金融業指明方向：以金融賦能實體經濟，推動金融與創科、綠色產業深度融合，培育新質生產力。作為金融從業者，我們更應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立足自身專業優勢，既要鞏固傳統金融領域的領先地位，也要積極投身新興金融賽道，助力香港強化金融樞紐功能。

GFCI39的排名結果，是肯定更是動力。香港憑藉國家支持、制度優勢與市場活力，在全球金融版圖中地位愈加穩固。香港須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作用，對接國家發展大局，在激烈國際競爭中持續強化優勢，書寫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為國家金融開放與區域經濟繁榮貢獻更大力量。

# 改善劏房兒童生活環境 扶助身心健康成長

林正財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



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推算，約有3.4萬名兒童居住於劏房。多項研究顯示，居住環境對兒童身心發展具有顯著影響。因此，協助劏房戶改善居住條件，對劏房兒童的健康與成長具有直接且正面的效果。

筆者在農村中的「泥屋」成長，深知惡劣居住條件對兒童的負面影響。狹窄的活動空間會影響體能發展及身體發育；睡眠質量差會削弱學習表現；在心理層面，兒童可能產生自卑、焦慮或抑鬱等問題。然而，多數劏房住戶受到經濟限制，難以在市場上找到既舒適又可負擔的住宅。因此，特區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幫助這些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對打破代貧窮與促進兒童發展至關重要。

開闢空間 鍛煉身心增社會互動

特區政府興建的「簡約公屋」與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過渡性房屋，能為有需要的家庭在未獲編配傳統公屋前提供臨時而穩定的居所，讓兒童及早脫離惡劣居所。

2024年發表的研究《香港低收入家庭的住環境與兒童早期成長發展》指出，人均居住面積少於7平方米的擁擠環境，與嬰幼兒整體發展量表(CREDI)分數呈負相關，意味着活動空間不足會阻礙嬰幼兒的運動與精細動作練習，不利身體與認知發展。擁擠也與母親壓力及兒童營養不良呈正相關：較差的住房會影響照顧者心理

健康，進而削弱照顧與營養效果，最終影響兒童成長。研究亦發現，改善房屋質量可降低照顧者的焦慮與抑鬱，令親職互動與兒童的發展和營養狀況更佳。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合作進行的研究亦指出，劏房環境顯著影響兒童的心理與學業表現。近四成受訪劏房學童表示家中缺乏學習空間，逾四成表示缺乏遊玩空間；相較於非劏房兒童，劏房兒童的抑鬱、焦慮與壓力水平均明顯較高。在該研究中，多位受訪兒童均曾表示，長期處於狹小空間易引發無助、焦躁等負面情緒，部分家庭更出現親子緊張或衝突；同時，行為實驗也顯示，對空間不足的主觀感受會影響兒童的語言記憶與注意力。綜合而言，劏房環境正以多重途徑損害兒童的身心發展，容易造成跨代貧窮。

相較於劏房，「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屋設有獨立洗手間，提供更佳衛生環境；同時，較多的活動空間對學童的身心發展更有利；「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屋的建築與維修更為標準化，相對劏房而言較不易受滲水、潮濕與黴菌問題的影響，從而降低哮喘、過敏與呼吸道感染等健康風險。此外，過渡性房屋或公屋社區常配備共享遊樂與學習空間(如遊樂場、社區中心等)，能提供安全的戶外活動與同儕互動空間，補償居所內活動空間的不足，促進運動、社交與認知發展。當照顧者的壓力得到紓緩，父母

的心理負擔降低，親職耐心與互動質量也會相應提升，有效促進兒童的語言刺激、情感回應與早期學習機會，間接提升兒童發展指標。

有效降低劏房戶搬遷負擔

儘管「簡約公屋」與過渡性房屋為劏房住戶提供了較安全、衛生與穩定的臨時居所，但劏房家庭仍可能由於不同考慮而未能遷出劏房，其中原因，可能是搬家需要一大筆開支以及新居所的交與生活成本高昂，為經濟狀況不太好的家庭帶來負擔。其次，有些家長可能因為擔心新地點距離原有工作地點太遠，寧願選擇留在原居。另外，資訊不對稱與申請障礙亦常阻礙行動：複雜的申請程序、文件要求、等待時間等，令部分住戶對搬遷成效持懷疑態度。因此，單靠提供房屋單位有時並不足以促使搬遷，其他社福服務必須同步作出輔助，使劏房戶更容易接觸到相關資訊及獲得服務支援，讓他們有更大信心和動力搬離劣質劏房。

俗語有云「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籬穀」，對經濟條件有限的劏房住戶而言，搬遷確實涉及多重權衡與風險。然而，「簡約公屋」與過渡性房屋若可提供配套支援，包括加強打擊濫用公屋、加快興建傳統公屋、落實簡樸房的監管制度等，就能切實降低家庭遷徙的障礙。透過供應與支援並重的策略，可望盡早幫助劏房兒童脫離惡劣居住環境，為他們提供更安全、健康且有利發展的成長空間。

# 「兩蚊兩折」平衡長者福祉與資源善用

郭芙蓉 立法會議員 葵青區議員



長者「兩蚊坐車」即將迎來改變。4月3日起，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由劃一兩元收費調整為「兩蚊兩折」：成人票價10元或以下，維持兩元；超過10元的，則付成人票價的兩折。受惠對象不變，樂悠卡繼續通行。

這項調整關乎約267萬名受惠人士，引發社會討論在所難免。有人形容這是向長者和弱勢「開刀」、轉嫁財政壓力的舉動，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二元優惠計劃推行多年，初衷是鼓勵長者多外出、多參與社區，建立關愛共融的社會，但計劃引伸了長者「長車短搭」現象，確實令財政資源未能用得其所以。「兩蚊兩折」的推出，既保留了政策原意，讓長者仍能以優惠價出行，同時確保公帑投放更精準，避免資源錯

配。更重要的是，社會不應簡單地將「長車短搭」的長者和長途乘客放在對立面。很多時候，長者並非故意，而是出於無可奈何。

筆者在荃灣、葵青區服務多年，這一帶是典型的「山城」，大量屋邨依山而建。街坊出行主要靠巴士、小巴，但短途班次有時過於疏落，候車時間過長；有時「短車」久久未到，當可以到達同一目的地的「長車」抵站，長者乘客為節省時間也照樣乘搭，反正對他們來說票價同樣是兩元，「長車短搭」的現象由此出現。故此，「長車短搭」的問題根源不在是否「兩蚊」，而在於公共交通網絡的規劃不全。

如今，要讓「兩蚊兩折」真正發揮作用，筆者有三點倡議：

第一、巴士公司應落實「上落車拍卡」的分段收費，讓真正需要坐長途車的長者，能以實際乘車距離計算車資。

事實上，這項技術並非新鮮事，但遲遲未有在香港的巴士全面推行。此法讓車資與優惠更精準、更公平，是業界應有的擔當。

第二、特區政府、巴士公司、區議會要通力合作，全面優化各區短途車路線及班次。當短途車足夠、候車時間合理，長者自然無須「被迫」登上長途車。

第三、既然「兩蚊兩折」政策劃出了清晰界線，巴士公司就應在車站增設清晰標誌，方便長者分辨「兩蚊車」與「兩折車」。

毫無疑問，二元優惠計劃是一項好政策，十多年來鼓勵了無數長者走出家門、融入社區。不過好政策要行得遠，不能只靠情懷，還需制度上的精準與平衡。

「兩蚊兩折」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讓好政策走得更遠，絕對是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同的責任。